

湖南乡村产业振兴模式与农村资源的耦合

曾广录¹ 秦小珊²¹

(1. 长沙大学学报编辑部, 湖南 长沙 410022;

2.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期刊社, 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由示范走上全域, 必须改变扶贫时代由外生力量推动的主导模式, 通过开发特色产业, 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动力。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走特色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形成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的乡村振兴模式是关键。从资源禀赋看, 与发展农村产业相关的资源可分为四大类: 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经济基础、主体资源。根据湖南实际, 与湖南农村地区资源禀赋相耦合的乡村振兴产业模式主要包括五类: 休闲旅游型、农旅融合型、特色农业型、文化传承型、综合治理型。根据市场投资动力的大小, 与这些产业振兴模式对应的主体资源耦合模式主要为市场型、市场+政府型、市场+政府+乡贤型、政府+乡贤+社会帮扶型。各地区应根据本地资源特点及经济实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 乡村振兴 资源禀赋 产业耦合模式 主体耦合模式 市场动力

【中图分类号】: F2 **【文章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160 (2022) 02-0094-13

一、引言

由于脱贫攻坚任务的全面完成, 2020 年成为中央政府农村发展战略的一个分水岭: 之前的脱贫攻坚奠定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础, 之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将巩固和提升脱贫成效的可持续性, 真正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已有的研究表明: 中国脱贫攻坚巨大成效的取得, 主要以政策支持、政府投入、企业和社会帮扶等外力作用为主, 脱贫攻坚中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在农村普遍存在^[1]。在以实现乡村振兴、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目标的后扶贫时代, 虽然政府财政投入、企业和社会帮扶等外力作用仍然必不可少, 但重点要以培育和引导农村产业发展、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形成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主, 增强农村地区的自我“造血”功能, 由外生动力推动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向内生动力推动为主的发展模式。因此, 乡村振兴战略下,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进一步开放农村市场, 鼓励企业或从农村地区走出去的精英人士及本地农民利用本土特色资源, 发展适合本地区的特色产业, 走差异化的乡村产业振兴之路。

2020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南工作时对乡村振兴战略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深化农业农村改革, 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2]如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湖南的优势特色产业, 激发湖南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是湖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必须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乡村振兴模式与农村资源耦合视角, 探索增强湖南农村内生发展动力、适合农村具体实际

作者简介: 曾广录, 男, 湖南洞口人, 长沙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经济学、旅游地理学; 秦小珊, 女, 湖南长沙人,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期刊社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经济学、女性文学。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转型发展背景下湘西州旅游企业脆弱性及核心竞争力研究”(课题编号: 17YBX002)

的、有效的乡村振兴模式。

乡村振兴一直是近几年国内研究的热点，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如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3]、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4]、乡村地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5]、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6]、借鉴发达国家乡村演变与发展的经验^[7]、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衔接^[8]、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9]、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态的协同^[10]等。

由于各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乡村振兴不能走同质化道路。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关键的是要确定好适合本地区资源禀赋的乡村振兴模式。现有的研究中，出现了少量研究乡村振兴模式问题的成果。李二玲等^[11]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了中部平原地区的乡村振兴模式，提出了产业集聚、专业村、产业集群、创新极、精明专业化五种振兴模式；武小龙等^[12]从制度创新、振兴理念、振兴手段、振兴指导等方面研究了苏南地区的乡村振兴模式，总结了有借鉴价值的新苏南模式；吴丹丹^[13]依据资源禀赋条件总结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中出现的五种模式：农业服务型、工业发展型、休闲旅游型、文化传承型、综合治理型。也有少量学者开始研究湖南乡村振兴模式问题，如熊鹰等^[14]将湖南省 85 个县(市、区)划分为 9 种不同类型的乡村地域功能，并据此提出不同类型地域空间的发展建议，对推动湖南乡村转型和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参考价值；苏婵^[15]从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方面分析了全面促进湖南乡村振兴的思维模式。

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推进乡村振兴模式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但这些成果主要从产业集群、城镇化、区域功能与城乡融合、思维模式等角度来研究乡村振兴模式问题，而结合区域资源禀赋来研究乡村振兴模式问题的成果较少，特别是缺少从农村资源禀赋视角研究湖南各地区乡村振兴模式问题的文献。本文围绕特色产业发展这一内生动力问题，结合湖南省各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和各主体资源的投资动力或行为动机来研究湖南农村实施乡村振兴的模式问题。

二、影响湖南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主要资源分析

要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走特色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形成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的乡村振兴模式，对农村资源禀赋的充分了解、把握是前提。根据《湖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关于产业兴旺战略规划指标体系(表 1)，涉及的产业主要包括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农村旅游业。完成这些产业发展指标所关联的资源主要有地形地貌等自然资源、传统文化或红色文化等文化资源、GDP 水平和关联产业方面的基础、引领乡村振兴的主体资源等。

表 1 湖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产业兴旺战略规划主要指标

序号	主要指标	单位	2016 年基期值	2022 年目标值	年增长率/(%)	属性
1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亿吨	0.29	≥0.3	≥3.4	约束性
2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	57	63	6	预期性
3	农业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3.1	>5.5	>77.4	预期性
4	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	%	2.2	2.7	22.7	预期性

5	休闲农业与农村旅游接待人次	亿人次	3.07	7.64	148.9	预期性
---	---------------	-----	------	------	-------	-----

(一)自然资源

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特征等自然资源是决定乡村社会发展的先天性条件。从地理位置来说，离城市越近、交通条件越好的农村地区，其发展农村产业的条件越优越，边远地区的农村产业发展条件显然不如交通相对发达的郊区农村。不仅如此，其发展条件还与城市大小有关系，大城市郊区的农村显然比中小城市郊区的农村发展条件更好。从地形地貌来说，平原地区发展农业或农业综合体的产业条件要好于山区农村，而山区农村发展特色种植业或养殖业的条件相对要好，那些有奇特地理外貌特征的山地则具有发展旅游产业的潜在优势。

(二)文化资源

就农村地区来说，其文化资源主要体现在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两方面。农村地区传统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就是传统村落。传统村落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各种文化遗产，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更承载着各民族的源文化和根文化。如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居、祠堂、道观、寺庙、水利设施、街巷等特色建筑，用于生产生活的特色器皿、工具、工艺品等人造物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反映村民生活方式的传说故事、节日仪式、俚语方言、宗教信仰、民间音乐、乡土艺术、地方戏曲等，体现村落社会组织关系的伦理道德、婚姻族规、村规民约、组织体制、经济制度等制度性文化。传统村落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等价值。一个地方传统村落的文物遗产，地域性、唯一性特征十分明显，也是不可复制和不可再生的。这些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传统村落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农耕文明，是弥足珍贵的公共文化资源。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公布了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计6819个，其中湖南有658个。保护、开发这些传统村落本身就能形成一个新的产业。有些地区的传统村落，其文化资源十分珍贵，通过保护性开发可以在这些地区形成新的旅游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另外，湖南很多农村地区是革命老区或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过重要的军事活动，留下了许多值得挖掘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当今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和红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好这些红色资源，建构新的红色旅游产业和红色教育基地，对促进这些地区的乡村振兴也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三)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旅游业或农业等关联产业发展基础、居民收入水平、市场规模等方面的资源。GDP水平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GDP越高，说明该地区二、三产业发展越好，市场规模也越大，对农村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越强，乡村振兴也就具备越好的经济基础。旅游业或农业是实现湖南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两大关联产业，其基础越好，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发展乡村旅游或特色农业的条件就越好，反之亦然。就市场规模来说，市场化水平越高、市场规模越大的农村地区，其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越强，发展农村产业的条件就越好，因为规模大的市场更能吸引市场主体的投资，对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更为有利。

(四)主体资源

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基础是支持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特色的基础性资源，是既定的难以改变的资源禀赋。当然，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资源发展农村特色产业还离不开强有力的实施主体的引领作用和投资行为。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实施乡村振兴的投资主体或引领主体主要包括五类：政府、企业、乡贤(乡村精英)、村民、社会帮扶。根据投资动机或行为动机，政府和社会帮扶属于非市场主体；企业和村民属于市场主体；而乡贤则包括两种：那些以营利为目标进行投资的乡贤属于市场主体，具有强烈

家乡情怀并投入家乡建设的乡贤则属于非市场主体。

从政府主体看，有足够政府财力支撑的地区当然可以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来扶植农村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单一政府”主体资源模式，但对于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地区，一方面可通过上级政府的统筹安排与协调，也就是上级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将富足地区的财政资源调往不足地区，支援这些地区乡村振兴建设，另一方面则需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状况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帮扶”的主体模式。由于湖南多数地区政府财力有限，发动政府以外的主体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显得十分重要。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乡贤来看，除社会责任感外，更多的是取决于投资动力，即是否有利可图，这不仅要自然看自然资源或文化资源条件以及由此决定的发展旅游业或农业的条件或基础，还要看当地的经济水平及其所决定的市场消费规模，即是否存在开发旅游业或农业的潜在商业价值，适合发展规模化旅游业或农业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市场主体投资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形成“企业+乡贤”主体模式。从村民这一市场主体看，不仅要有很强的投资意愿，即投资动力，还要有足够的收入水平来支撑，即投资能力。对于收入水平高，融资能力强，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文化资源又适合调动村民投资动力的地区则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形成“单一村民”主体资源模式。从作为非市场主体的乡贤看，其行为动机主要是改变家乡面貌、建设家乡的情怀，那些乡贤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还可以通过发挥乡贤的力量来实施乡村振兴，形成“单一乡贤”主体资源模式。从社会帮扶力量看，其行为动机主要是社会责任感或慈善情怀，对于各种资源缺乏的农村，发动社会力量实施一对一帮扶也不失为一种实施乡村振兴的主体资源模式。

综合来看，单一主体资源模式的力量毕竟有限，更多的是各种主体资源的叠加，如在许多农村地区成功实施的“政府+公司+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与自然资源、经济基础、文化资源不同的是，主体资源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或激励手段加以改变，具有相对灵活性。

三、与湖南农村资源相耦合的乡村振兴模式

根据经济学原理，从激发内生动力、开发特色产业来看，本地的资源条件是最重要的考量，因为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可大幅度降低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所需的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提升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效率，资源优势本质上就是成本优势。因此，农村地区要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因地制宜，形成与区域资源禀赋相耦合的乡村振兴模式。

各农村地区探索有效的乡村振兴模式，首先要考虑的是农村地区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现有的经济发展基础等既定资源禀赋情况。根据这三类资源禀赋不同状况的组合可构建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与沿海地区不同的是，湖南农村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加上生态发展理念的要求，除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外，湖南农村一般不适宜通过工业发展模式来实现乡村振兴。因此，借鉴吴丹丹^[14]的研究成果，结合湖南实际，从一般意义来说，与湖南农村地区资源禀赋状况相耦合的乡村振兴模式可从五种类型来分析：(1)休闲旅游型；(2)农旅融合型；(3)特色农业型；(4)文化传承型；(5)综合治理型。如表2所示：郊区的农村，如果传统文化资源或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旅游业发展基础好，市场消费规模大，但农业发展基础弱，则可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走休闲旅游型的振兴模式，如长沙、岳阳、株洲等大城市郊区的农村；处于中间地带的平原地区，传统文化资源或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但旅游业基础弱，市场规模不大，农业发展基础好，则可将文化资源优势 and 农业优势融合起来，构建农旅融合型产业品牌，走休闲农业或旅游农业型振兴模式；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如果缺少传统文化资源或红色文化资源，旅游业发展基础差，市场消费规模小，但农业发展基础较好，又有一些传统知名农产品品牌，如安化黑茶、古丈毛尖、保靖黄金茶、黔阳冰糖橙、炎陵黄桃、江永香柚、华容芥菜、沅江芦笋、新晃黄牛、宁乡花猪、汉寿甲鱼等，可充分利用农业发展基础或特色农产品的品牌优势，通过强化品牌管理走特色农业型振兴模式；地处偏远山区的农村，如果传统文化资源或红色文化资源丰富，而且聚集性强，但旅游业和农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市场消费规模小，则可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及其聚集性优势，通过政府投资或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对传统文化或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活化，适度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此带动乡村面貌改善，走文化传承型的振兴之路；对于那些文化资源缺乏，旅游业和农业发展基础弱，市场规模小的乡村，也就是说，各种资源都缺乏的地区只能通过上级政府的财政投入或倡导社会力量帮扶等方式，走综合治理型的振兴之路，注重对人居环境的改造，努力提升村民综合素质，创造新的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表 2 与资源禀赋相耦合的湖南乡村振兴主要模式及其市场投资动力

有代表性的资源禀赋状况	产业耦合模式	市场投资动力	主体耦合模式
城市郊区，传统文化或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旅游业基础好，市场规模大，农业基础弱。	休闲旅游型	强	市场型
中间地带，地处平原或丘陵，传统文化或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旅游业基础弱，市场规模不大，农业基础好。	农旅融合型	较强	市场+政府型
位置相对偏远，无传统文化或红色文化资源，旅游业基础差，市场规模小，农业基础好或有知名农产品。	特色农业型	较强	市场+政府型
偏远山区，传统文化或红色资源丰富，旅游业和农业发展基础都弱，市场规模小。	文化传承型	弱	市场+政府+乡贤型
地处山区或丘陵，文化资源缺乏，旅游业和农业发展基础薄弱，市场规模小。	综合治理型	无	政府+乡贤+社会帮扶型

其次，在根据既定资源禀赋确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模式基础上，还要根据主体资源禀赋状况，确定实施乡村振兴的主体投资力量。例如：休闲旅游型模式，由于农村资源禀赋条件最好，产品开发的商业价值最高，因而其市场主体投资的动力强，政府完全可以放开手脚让市场主体力量来投资；特色农业、农旅融合模式，虽然具有产品开发的商业价值，但由于资源禀赋相对较弱，市场规模有限，市场主体有一定的投资动力，但弱于休闲旅游型模式，需要政府通过财政资源的投入，引导企业、村民积极参与的方式来实施乡村振兴；文化传承型模式，自然资源、经济基础不利于产业发展，虽然文化资源丰富，但因分散稀少，开发的商业价值有限，市场主体投资动力较弱，加大政府和乡贤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力度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首要模式；对于综合治理模式，由于各种资源缺乏，没有商业价值可言，市场主体基本没有动力投资，必须发挥政府或有情怀的乡贤或社会力量帮扶的作用。各种产业耦合模式的市场主体投资动力大小如表 2 所示：休闲旅游型模式的市场投资动力最大；特色农业型和农旅融合型模式，市场有较大的投资动力；文化传承型模式，市场有一定的投资动力；综合治理型模式，市场投资的动力基本不存在。

综上所述，乡村走什么样的振兴之路，从资源禀赋视角看，可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一是既定的产业资源禀赋，二是相对灵活的主体资源禀赋。如图 1 所示，确定产业耦合模式的依据是各种不同的既定资源禀赋状况，确定主体耦合模式的依据是各主体投资动机或行为动机及由产业耦合模式决定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动力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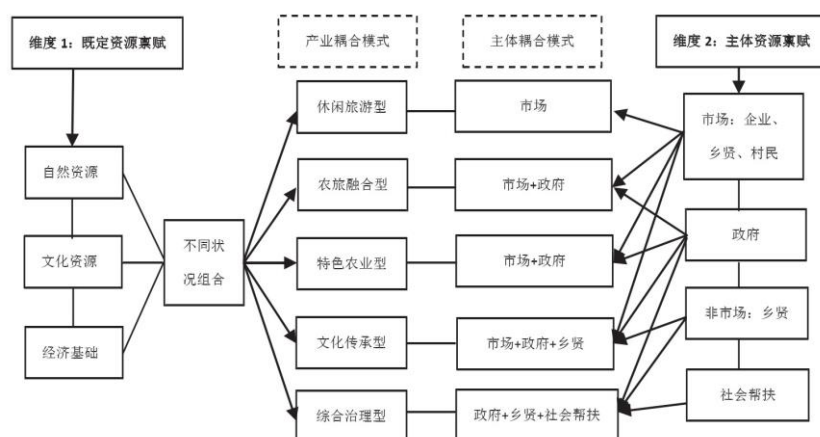


图1 依据资源禀赋两维度确定的湖南乡村振兴主要模式

四、湖南各市州资源禀赋分布格局及乡村振兴的主导模式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湖南各农村地区的地形地貌千差万别，经济基础和产业发展条件各异。与全国多数省份一样，湖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振兴乡村产业，走特色化产业发展之路。根据产业发展模式与区域资源相耦合的理论，要做到振兴湖南农村产业，形成内生化的动力机制，各地区产业发展模式必须与其所具备的资源状况相耦合。这里基于湖南省十四个市州行政区域，运用数理统计和 ArcGIS 地理绘图技术，从地形地貌、GDP、旅游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乡村人均财政资源、传统村落和农村地区红色资源分布七方面分析湖南省区域资源分布格局或特征，在此基础上，从宏观上分析与各市州资源特征相耦合的乡村振兴主导模式。

所用数据中，(1)GDP、旅游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各市州财政收入数据均为 2019 年数据，来自 2020 年《湖南省统计年鉴》(注：受到疫情影响，2020 年数据不具代表性，故采用 2019 年数据)；(2)湖南省 658 个传统村落数据来源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公布的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各农村地区红色资源数据来源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网上公布的数据，经纬度数据均来源于网上搜索；(3)湖南省行政区划数据来自湖南省基础地理信息技术系统。

(二) 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分布格局

影响农村产业特别是农业发展及其规模化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地形地貌和地理位置。根据许建和等^{[16]148-149} 学者对湖南省地形地貌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湖南省域可概括为五大地理区：(1)湘西切割山地区，湘西州、怀化、张家界三个地区处于这一地带，地理位置偏远；(2)湘南延伸丘山区，郴州、永州、衡阳三个地区处于这一地带，地理位置比较偏远；(3)湘东带状山丘区，株洲、长沙处于这一地带，地理位置优越；(4)湘中隆起丘陵区，娄底、邵阳、湘潭处于这一地带，娄底和邵阳地理位置相对偏远，湘潭地理位置较为优越；(5)湘北河网平原区，岳阳、常德、益阳处于这一地带，地理位置比较优越。

(三) GDP、旅游业和农业发展水平分布格局

运用 ArcGIS 方法，根据湖南省各市州 2019 年 GDP、旅游业总收入、农业总产值等统计数据，分别绘制出湖南省各市州 GDP、旅游业和农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图(见图 2、图 3、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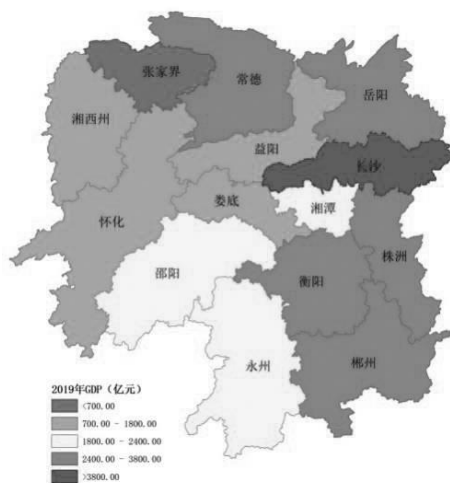


图2 湖南省各市州 GDP 空间分布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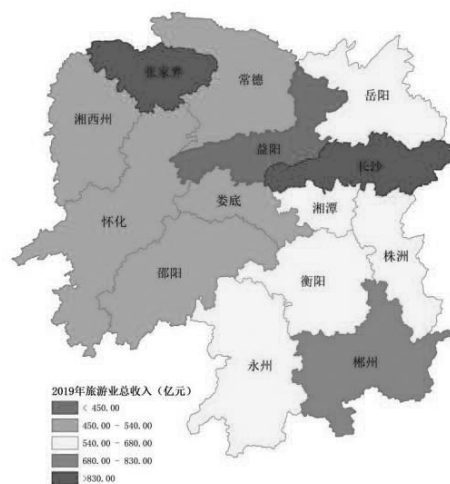


图3 湖南省各市州旅游业产值空间分布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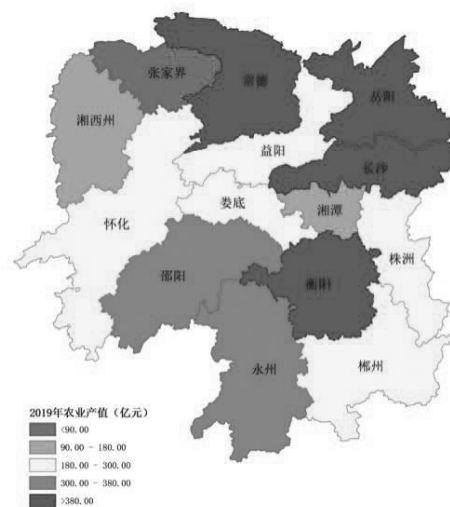


图 4 湖南省各市州农业产值空间分布格局

由图 2 可知：湘东长沙的 GDP 水平最高，在 3800 亿元以上；湘东的株洲、湘北的岳阳和常德、湘南的衡阳和郴州 GDP 水平较高，都在 2400 亿元以上；湘中的邵阳和湘潭、湘南的永州 GDP 水平居中，处于 1800—2400 亿元之间；湘中的娄底、湘北的益阳、湘西的怀化和湘西州 GDP 水平较低，处于 700—1800 亿元之间；湘西的张家界 GDP 水平最低，低于 700 亿元。由图 3 可知，湘东的长沙、湘西张家界的旅游业基础最好，其次为郴州，再次为株洲、岳阳、湘潭、衡阳、永州等地区，常德、湘西州、怀化、娄底、邵阳的旅游业基础较差，益阳的旅游业基础最差。由图 4 可知，湘东的长沙、湘北的岳阳、常德和湘南的衡阳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高，农业发展基础好；湘南的永州和湘中的邵阳农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湘东的株洲、湘中的娄底、湘北的益阳、湘西的怀化和湘南的郴州农业发展水平中等；湘中的湘潭、湘西的湘西州的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农业基础较差；湘西的张家界农业发展基础最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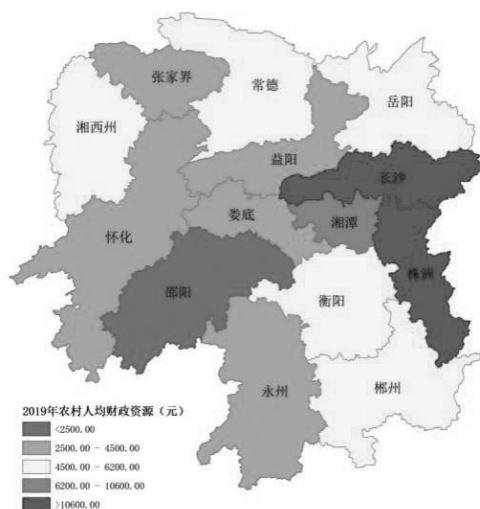


图 5 湖南省各市州农村人均财政资源空间分布格局

(四) 农村人均财政资源的分布格局

运用 ArcGIS 方法，根据 2019 年每个市州农村劳动力平均拥有的财政资源(市州财政收入除以该市州农村劳动力总量)，绘制出各市州农村人均财政资源空间分布图(见图 5)。由图 5 可知，湘东的长沙和株洲农村地区的人均财政资源最好，人均在 1 万元以上；湘潭相对较好，在 6000 元以上；湘北的岳阳和常德、湘南的郴州和衡阳、湘西州居中，处于 4500—6000 元之间；较差的为张家界、益阳、娄底、怀化、永州，处于 2500—4500 元之间，人均财政资源最差的为邵阳，人均在 2500 元以下。

(五) 农村文化资源空间分布特征

传统文化资源以传统村落为典型代表。湖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情况如图 6 所示。受地理区域限制，单个的传统村落即使有较高文化遗产价值，在发展旅游产业上也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但如果同一个区域内传统村落数量多、聚集性强，则容易形成规模化的旅游产业，对企业投资开发旅游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根据许建和等^{[16]148-149} 学者的研究，湖南省域因险要的地形造成了西部和南部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单元，影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湘西与湘南的传统村落数量多、聚集性明显。湖南其他地区的传统村落则相对稀少、分散。

湖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领导和发动革命的地区之一。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最早是从湘赣边境的农

村地区开始探索的，加上湖南近代史上涌现了众多革命领导人物和英雄人物，使得湖南分布着大量红色文化资源。如图 7 所示，湖南各市州农村地区都有许多红色景点，相对来说，湘东的长沙、株洲，湘中的湘潭，湘南的郴州、衡阳，湘西的张家界，红色景点聚集性较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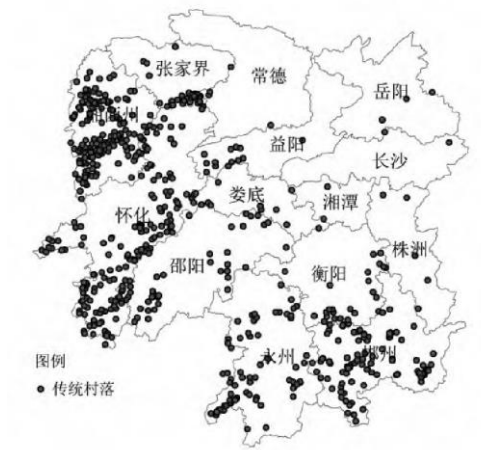


图 6 湖南各市州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



图 7 湖南各市州农村红色资源分布格局

(六) 各市州乡村振兴主导模式与区域资源耦合分析

表 3 湖南省各区域产业资源禀赋空间分布格局比较

区域	市州	地形分布格局	GDP 空间格局	旅游业空间格局	农业空间格局	人均财政资源格局	传统村落聚集性特征	红色景点聚集性特征
----	----	--------	----------	---------	--------	----------	-----------	-----------

湘北	岳阳	河网平原区	中上水平	中上水平	高水平	次好	稀少分散	零星分散
	常德	河网平原区	中上水平	中下水平	高水平	次好	稀少分散	稀少分散
	益阳	河网平原区	中低水平	低水平	中等水平	较差	零星分散	稀少分散
湘南	郴州	延伸丘山区	中上水平	中上水平	中等水平	次好	规模聚集	规模聚集
	衡阳	延伸丘山区	中上水平	中上水平	高水平	次好	规模聚集	规模聚集
	永州	延伸丘山区	中等水平	中等水平	中上水平	较差	规模聚集	零星分散
湘中	娄底	隆起丘陵区	中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较差	零星分散	稀少分散
	邵阳	隆起丘陵区	中等水平	中低水平	中上水平	最差	零星分散	稀少分散
	湘潭	隆起丘陵区	中等水平	中等水平	中下水平	较好	零星分散	规模聚集
湘东	长沙	带状山丘区	高水平	高水平	中等水平	最好	稀少分散	规模聚集
	株洲	带状山丘区	中上水平	中等水平	中等水平	最好	稀少分散	零星分散
湘西	张家界	切割山地区	低水平	高水平	低水平	较差	规模聚集	规模聚集
	湘西州	切割山地区	中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低水平	次好	规模聚集	稀少分散
	怀化	切割山地区	中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较差	规模聚集	稀少分散

基于湖南省地形地貌分布特征的五大地理区域，结合图 2 至图 7 所示的这些地区在 GDP、旅游业和农业两大关联产业、农村人均财政资源空间分布、传统村落和红色资源这两大农村文化资源空间分布上的格局，形成湖南各区域产业资源禀赋的综合比较表(参见表 3)。

从表 3 可看出,湖南省农村地区地形条件和地理位置各不相同,各市州经济发展水平、人均财政资源、文化资源和主体资源极不平衡。要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形成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道路,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区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情况,找到适合本地区资源特色的产业发展道路和乡村振兴模式。由于湖南省行政村数量众多,难以根据每一个行政村的实际状况分析适合其特色资源的振兴模式。这里以市州为例,并根据表 3 显示的各市州资源分布格局,从宏观上分析与各地区资源禀赋相耦合的乡村振兴主导模式,目的是为各市州确定乡村振兴模式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

1. 湘北地区

湘北的岳阳、常德和益阳离大城市相对较近,位于中间地带,地形多为河网平原,交通便利,农业相对发达,有很多知名农产品品牌,如安化黑茶、汉寿甲鱼和蔬菜节,但旅游业基础弱,农村文化资源少而分散,其乡村振兴模式应以特色农业型为主。当然,那些文化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也可走农旅融合型道路。从主体资源来看,除益阳较差外,岳阳、常德农村的人均财政资源相对较好,而且这些地区历史上一直是湖南相对发达的地区,从农村地区走出来的精英人士较多,乡贤力量也比较大,因此,可在发挥政府财政资源相对优势基础上,充分调动企业或乡贤等市场主体力量,走市场和政府共同投资的农旅融合型或特色农业型模式。如岳阳县张谷英村,遗存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民俗,为国家级传统村落,地势平坦,农业也相对发达,是湖南省乃至全国的南方地区汉系文化传统村落遗产博物馆^[17],但单纯发展旅游产业的潜力有限,由于该地区有较好的特色农业发展基础,可通过政府财政和政策支持,鼓励农业企业和村民投资来发展生态特色农业,传承优秀文化,走农旅融合型乡村振兴之路。

2. 湘东地区

湘东主要包括长沙、株洲等。长沙的农村离大城市最近,地形多为带状山丘区,旅游业发达,农业基础处于中等水平,传统村落较多,聚集性较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GDP 水平和人均财政资源最好,市场消费规模最大,其乡村振兴模式应以休闲旅游型为主。而且因开发休闲旅游产品的商业价值高,市场消费规模大,市场应成为长沙地区实施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湘东株洲农村在各方面的资源禀赋要弱于长沙,但相对其他地区来说,地理位置、人均财政资源和市场规模仍然具有优势,以市场为主体力量的休闲旅游型模式仍可确立为主导模式。当然,少数离大城市较远的山区农村,则另当别论,可实施与其资源禀赋相耦合的其他模式。

3. 湘西地区

湘西地区离大城市远,位置偏远,地形主要以切割山地为主,许多农村地区旅游资源和旅游产业发达,红色文化资源除张家界外相对较少,但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丰富,聚集性强,农业基础较差,其乡村振兴模式主要以文化传承型为主或农旅融合型为主。如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域内的侗族传统村落群,沿坪坦河蜿蜒而下,30km 流域范围内带状分布着 20 多个极具侗族文化特征的传统村落,可分别结合流域的局部地形地貌特征以山谷、山腰、山脊等地理环境为基础,在多样微观地理景观背景下展现通道侗族特色文化的传统村落特质^{[16]152},连片开发这 20 多个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资源可形成规模化旅游资源优势,对旅游公司的投资开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当然,这一地区也存在许多资源禀赋差、文化资源缺乏的乡村,只能以综合治理型模式来实施乡村振兴,政府应充分调动其他富足地区的财政资源或社会力量来帮扶,财政引领可在中央财政投入基础上,统筹地方财政资源,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或补贴政策激发社会力量的投入动力。

4. 湘中地区

湘中的湘潭、娄底、邵阳地形基本相似,多为隆起丘陵区,旅游业和 GDP 处于中下水平,农村文化资源分散、稀少,但位置偏远程度、人均财政资源有所不同,湘潭地处中间地带,人均财政资源和乡贤等主体资源相对好于其他两地区,娄底和邵阳的位置较偏远,财政资源较差。根据这一资源分布格局,其农村地区应以特色农业或综合治理型为主。对于农业基础好,有特色农产

品品牌优势的农村地区可发展特色农业来实现乡村振兴，如邵阳洞口一些农村可以雪峰蜜橘为特色带动乡村振兴。对于大多数缺乏资源优势的农村地区来说，则主要以综合治理型为主，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乡贤和社会帮扶的力量。当然，湘潭个别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也可选择农旅融合或休闲旅游型的产业振兴模式。

5. 湘南地区

湘南的衡阳、郴州、永州农村多为延伸的丘山区，其中，衡阳地理位置相对优越，旅游业和农业基础、人均财政资源都较好，农村文化资源也相对丰富，适宜通过农旅融合型或特色农业或文化传承型模式来实施乡村振兴，其振兴主体也主要以市场力量为主；郴州、永州的农村人均财政资源较差，旅游业和农业基础不强，但农村文化资源丰富的乡村较多，而且聚集性强，可通过农旅融合型或文化传承型模式实施乡村振兴。当然那些各种资源都缺乏的地方，其振兴模式应以综合治理型为主。由于这一地区主体资源相对缺乏，除能够调动市场主体力量的农村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应采取以政府、乡贤或社会力量帮扶为主的振兴模式。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与脱贫攻坚外生推动模式不同，乡村振兴应确立以发展特色产业为主的内生推动模式。乡村振兴从示范走上全域，要提升乡村振兴效率，必须走与各农村地区资源禀赋相耦合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从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出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的资源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经济基础和主体资源。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成果，结合湖南实际，与湖南农村资源禀赋相耦合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五大类：特色农业型、休闲旅游型、农旅融合型、文化传承型、综合治理型。根据市场投资动力大小，与这些产业振兴模式相对应的主体耦合模式为市场型、市场+政府型、市场+政府+乡贤型、政府+乡贤+社会帮扶型。

(二) 建议

根据主体资源的市场化特征和耦合理论，从宏观上来说，湘北的岳阳、常德和益阳地区乡村振兴主要以农旅融合型或特色农业型为主，其振兴主体可以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主体为主；湘东的长沙、株洲农村地区乡村振兴模式应以休闲旅游型为主，完全可由市场主体来投资；湘中的湘潭、娄底、邵阳的农村地区应以特色农业型或综合治理型为主，湘南的衡阳、郴州、永州农村应以农旅综合型或文化传承型为主，湘西的湘西州、怀化、张家界农村地区的振兴模式应以文化传承型和综合治理型为主。湘中、湘南、湘西三个地区主体耦合模式主要以市场+政府型或市场+政府+乡贤型为主，选择综合治理型模式的乡村则主要以政府+乡贤+社会帮扶型为主。

当然，上述各市州乡村振兴的主导模式是依据各市州宏观上的资源分布格局或特征来分析的。微观上，各市州内不同农村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仍然存在，因而对处于某一市州内的乡村，需要根据农村的具体实际，因地制宜，以实现乡村振兴模式与资源禀赋在微观上的耦合。

参考文献:

[1]Guanglu Zeng,Chenggang Zhang,Sanxi Li.The Dynamic Impact of Agricultural Fiscal Expenditures and Gross Agricultural Output on Poverty Reduction:A VAR Model Analysis[J].Sustainability,2021(5): 5766.

[2]新华社.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EB/OL].(2020-09-18)[2021-09-09].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18/c_1126512380.htm.

-
- [3]苏毅清,游玉婷.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2016(8):17-28.
- [4]姜长云.科学理解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J].管理世界,2018(4):17-24.
- [5]桂胜,朱罗敬.欠发达地区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逻辑研究——基于对中部省Y县F村的自治经验考察[J].湖北社会科学,2018(8):47-55.
- [6]姜申未,杨朝现,信桂新,等.基于乡村产业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6):781-787.
- [7]芦千文,姜长云.欧盟农业农村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J].中国农村经济,2018(10):119-135.
- [8]李实,李玉青,李庆海.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演化[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30-43.
- [9]朱天义,张立荣.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培育农业经营主体的行动逻辑——基于“情境—过程”分析框架的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2021(4):117-124.
- [10]蒋正云,周杰文,赵月.乡村振兴背景下中部地区农业经济—社会—生态现代化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6):99-108.
- [11]李二玲,邓晴晴,何伟纯.基于产业集群发展的中部传统平原农区乡村振兴模式与实现路径[J].经济地理,2019(12):110-118.
- [12]武小龙,谭清美.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9-29.
- [13]吴丹丹,吴杨,马仁锋,等.浙江美丽乡村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J/OL].世界地理研究,(2021-04-30)[2021-10-09].<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31.1626.P.20210429.1645.002.html>.
- [14]熊鹰,黄利华,邹芳,等.基于县域尺度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划分——以湖南省为例[J].经济地理,2021(6):162-170.
- [15]苏婵.助推湖南乡村振兴的几点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21(4):70-76.
- [16]许建和,乐咏梅,毛洲,等.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影响因素与保护模式[J].经济地理,2020(10):148-154.
- [17]李伯华,李珍,刘沛林,等.聚落“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路径研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J].地理研究,2020(8):1794-1806.